

西安东木头市街的窦家大院

■往事

西安东木头市街的中段108号,是一座坐南朝北、三进三开的宅院,我称之为窦家大院。大院的主人叫窦自强,窦老先生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公历1902年2月8日),因他年轻时在韩城老家救过比他年长9岁,当时正被人追杀的杨虎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杨虎城将军为了感恩,1925年把窦自强接到西安,后又购买了东木头市街30号(后改78号与108号)一处晚清官员的宅院赠给他。于是就有了窦家大院以后的传奇。

窦自强先生到西安后,就跟着杨虎城将军当兵从了军,1925年至1937年期间,干过军需,任过军需科长、秘书,杨虎城兼任省政府主席后,又委派窦先生担任了陕西财政特派员公署会计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于跟随杨虎城将军参加经历了“西安事变”始末的窦自强,自然受到牵连,杨虎城被责令出国考察,窦自强亦退出军队。

虽然杨虎城临行前将窦自强托付给时任陕西省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宁升山关照,但这一段窦自强先生仍历经坎坷,一事难为。30年代初窦自强还任过陕西武功县税务局、西安市包裹税务局局长。但他曾经作为杨虎城的亲信,自然处处受掣肘,另外,他不是国民党党员,也自然受排挤。加之官场腐败,尔虞我诈,让他感觉极憋屈窝囊。于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

窦晓莉在《爷爷的故事》一文中写有:“后来叔祖父(窦自强)又转向商界,……1932年同人友时居九等在马坊门开了一间利群商店,从卖布头做起,生意渐至做大。1956年,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号召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叔祖父将埋藏在‘利群商店’地下的四千多块银元无偿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1956年1月20日的《西安日报》以‘四千

块银元的故事’为题,报道过此事。”

作者窦晓莉把窦自强称叔祖父,她的祖父和窦自强是亲兄弟。据窦晓莉回忆,战乱年代她的祖父带着一家逃亡到西安,就住在东木头市窦家大院,她的祖父一直到1956年离开人世,都是窦自强先生为其养老送终的。窦晓莉还回忆说:她的父亲七八岁时也被带到西安,由叔祖父、叔祖母抚养,幸运的父亲受到正规教育,从小学上到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兵工署兵器研究所轻兵器研究所工作。1948年父母随南京政府撤退到台湾……他们留下襁褓中需要抚养的我,更严重的是我的父母去了台湾,可苦了我们在大陆的



窦自强和他孙女窦晓莉

人。从此,我的叔祖父有了一个甩不掉的可怕的台港关系。

1944年至1945年,窦自强曾在陕西省戏剧学校干过很短时间的总务主任。到解放后,窦自强先生出资资助东木头市小学(伦海小学),并任过一段时间校长。

进入21世纪时,窦家大院老屋因年久失修,墙倒屋塌,已残破不堪,连屋脊上的螭吻砖雕都脱落塌了下来,倒卧在房顶上。三进院也不完整,一部分因被强占者胡拆乱盖,使本来宽敞的院落,已经成了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过的狭道。但厅房木制大梁顶的驼墩、斗拱,其上面的木雕,工艺和图案都极为讲究,雕工更是精湛。再有只剩两扇的格子门上精美而寓意吉祥的“四季平安”木雕,都让人一睹而难忘。可惜的是屏风门上边的三幅彩绘图“福禄寿三星”“琴棋书画”“必定如意”,都被黑墨汁画上了大叉叉,这应当是“文革”“破四旧”,红卫兵抄家时留下的遗痕了,而笔者觉得这种遗物才别有意味,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见证物。

窦家大院偏院有密室,南边一处坍塌的厦房内还有一条青砖箍砌的晚清时的老地道。不过出口已被瓦砾掩埋,主人不介绍,来人真不知道。当年这个老地道,在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时,成了防空洞,那可是东木头市这一带平民百姓的避难所。能保留一百多年,也成了西安抗战历史的见证。

窦自强的孙女窦晓卉撰写《走进老宅院,感受百年建筑之精美》文章中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杨虎城在西安修建止园,同时也在东木头市108号的庭院里为我爷爷盖了上房和东、西两排厦房以及后院的九间房。所以,庭院的建筑装饰风格和止园是相同的。据老人回忆,盖房时,爷爷专门雇了10辆胶轮大车拉土,将后院垫高了很多,这样,雨水就由高到低流到大门外边了。”“上房门两侧的爱奥尼柱、门楣、窗台、窗楣都是用糯米、石灰、粘土做的具有西方风格的泥雕。泥花,爱奥尼柱的柱头还有海棠花、蝴蝶、大象等象征’捷

(蝶)报满堂(棠)、太平有象’的中国元素,这种中西结合的建筑特点和止园杨虎城公馆的建筑风格同出一辙。”

因之这所宅院成了从晚清到民国穿越交融,古典与现代同构的建筑典型,其中上房和东、西两排厦房应该是和青年路上杨虎城将军的“止园”采用同一设计方案,甚或由同一施工人员修建装饰的。中西合璧的独特结构样式,在西安真正是稀罕得少见。

当年的窦家大院不但是杨虎城将军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且杨虎城的母亲和夫人也经常来作客。据窦伯超先生生前给子女说:杨虎城将军的母亲将窦自强先生夫人卜淑贤认为干女儿,卜淑贤和与杨虎城将军的夫人结拜为干姊妹,杨夫人经常来窦家和卜淑贤夫人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关系很亲密,可谓通家之好。还说:当时不少陕西军政界的人人都来过窦家大院,连于右任先生也来过。1927年3月于右任先生曾为窦自强先生韩城老宅题写“庆有余”牌匾。

遗憾的是这块牌匾在2015年被人盗走,现在挂的匾是根据老照片重新复制的。

窦家三代人中,我在1976年前后,认识窦自强老先生的长子窦伯超老师。当年我在铜川市歌舞团编导组任创作员,窦伯超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从事音乐工作,因为我和他的同事、好友,陕西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的李开方很熟,而我们“铜歌”还排演过李开方编导的歌舞《送粮路上》,经李开方先生介绍我才有幸认识了窦伯超老师。后来知道,李开方与窦伯超,两人不但是同班同学,同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战友,同一所艺术馆的同事,还是一辈子的至交好友。

2016年前后我去拜访原陕西省文化局(厅)艺术处老处长雷达先生,还说起这一代省群艺馆的老艺术家,其中就有窦伯超、李开方、刘均平、费秉勋、高民生、李子等。随后我知道了窦伯超先生“文革”后就一直为窦家老宅的问题四处奔波,为“文革”中被强占的窦家房产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是费尽



窦自强先生韩城老宅

了心血。终于在1990年要回了部分窦自强先生名下的房产。1993年,窦宅被西安市城建委、西安市规划局、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列入“旧城区传统民居宅院和历史纪念性建筑”名单。

窦自强先生韩城坡头村的故居也得说上几句。而且至今这处老宅还保护得很好,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另外,因为窦氏是坡头村的大户,窦氏始祖源于河北燕山,明朝正統年間迁居韩城坡头,至今已有40余代。据此村民推断,坡头村的建村历史应该在唐朝末期,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三字经》中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而“教五子,名俱扬”还引出了“五子登科”典故。村里还有修葺一新窦家祠堂。因之我设想,把西安东木头市的窦家大院与韩城的窦自强故居都保护修复好,尽量恢复原貌,并建立一所博物馆,让两处互动起来,再把窦自强先生义救杨虎城的遗址开发出来,成为省级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肯定会为社会、为陕西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朱文杰

清末,发生在东北的那场鼠疫

■钩沉

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先后波及了69个县市,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疫情仅发生一个多月,吉林、黑龙江就有近两万人死亡。并且继续扩散,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阻,放眼望去,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

1910年夏,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由于早蝗传染发生鼠疫,中国男子张万寿恰值此时到鼠疫源地招募华工,10月初数名华工突然死亡,俄方驱逐染疫中国华工,使鼠疫由俄国传入中国境内。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两名被逐华工来到满洲里市,1910年10月25至26日,出现症状,相继死亡。

东北鼠疫不仅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

1911年1月,清政府召集北京所有医生在协和医学堂召开抗击鼠疫大会,商讨相关事宜,并指定协和医学堂为鼠疫防治中心。

为了控制和消灭这次鼠疫,东北三省治疫事务民政司详订章程,分飭各省内外所属州县迅速成立防疫会,负责本地防疫救治等事务。各省官府成立了以医官为首的卫生

警察,负责监督清扫城市卫生和捕鼠;他们身穿特制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户访问,把病人搬进临时设立的隔离室,对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对病人住处采取严格的隔离消毒措施。

早在1910年夏末,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列坚克斯与远东地区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就已经表现出了鼠疫流行的趋势。

这年10月12日,俄方证实了满洲里的首个鼠疫感染病例,至一个月后又发现了158例患者与72具死者的遗体。为了进一步控制病疫的蔓延,沙俄方面在该地实行了隔离制度,有大约3000人被转移至铁路线上的车厢内进行隔离观察。此举收到了极佳的效果,至11月28日已基本遏制了鼠疫在当地的流行趋势。

尽管如此,但沙俄政府驱赶大批华工出境的做法,还有日本方面的种种推阻之举,最终导致了鼠疫病菌携带者大量流动,疫情迅速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散播的严重后果。

一时间,长春厅、奉天、大连、天津、北京、济南等铁路、陆路、海路交汇之地均遭受到了鼠疫病菌的侵袭。此时数千公里的民众命悬于一线,如何控制疫情成为了考量此刻已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一道“生死命题”。

危急之际,曾在哈尔滨担任吉林滨江道台与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时为外务部右丞相的施肇基,上书指陈防控疫疾的重要性,力荐三十一岁的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负防控鼠疫的重任。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中国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檳榔屿。1896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成为继林文庆之后第二位获女皇奖学金的华人,旋赴剑桥大学学习,是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5年,伍连德与“纤细、柔弱,异常美丽且有文学天才的”黄淑琼结婚,与林文庆、吴蔚然成为连襟。黄淑琼是中国首位在西方出版英文书籍的中国女士,她倡导和支持伍连德回国建功立业,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特别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职。

施肇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那桐等人的有力支持,并终为清政府所采纳批准。1910年12月23日,经过休整后的伍连德同助手陆军医学堂学员林家瑞踏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并于翌日下午抵达了哈尔滨。

随后,清政府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朝廷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人数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为了能控制住局



后排为赴天津抗鼠疫的协和医院学生

面,官府先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疫区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授权伍连德全权接手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疗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防疫区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疗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防疫区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作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防疫区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12月26日夜,在哈尔滨傅家甸一名出嫁到当地的日籍客栈女老板因感染鼠疫而暴亡。12月27日早间,接到地方衙署通知后的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立即赶往事发地,并于贫民区中一栋昏暗的小楼内开始了紧张的剖检取样工作。

他首先用注射器从死者的右心房处抽取了足够的血液样本,并放置于试管中进行细菌培植,同时用显微镜进行涂片观察;接下来又切开肺脏与脾脏表面,用白金接种环提取了脏器中的物质用来培养与观察,并将感染的肺、脾、肝各取出一定大小的组织块放进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内。

待各项剖检取样结束后,伍连德将脏器归复原位与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装殓于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以备安葬。由于尸检是在外界不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

其迅速且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尸检,这样一来,他们为防治东北鼠疫获取到了重要的病体样本。

得到样本后,伍连德在临时辟建的实验室内关了四天,就提取的血液样本与脏器切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数有吕氏染色剂的血液、心、肺、肝、脾的切片样本中均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且为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形形状;而试管里的细菌经过培养后,也得出了鼠疫杆菌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论证,伍连德又将这些培养物放在室温下三天,并发现了状如针头的半透明菌落。他挑取其中一个菌落进行涂片观察,鼠疫杆菌的特征再度显现;而从心、脾、血液中提取的培养物则未受其他杂菌污染且十分纯净,但肺片培养物显示轻度污染。

根据上述情况,伍连德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学说。随后他将有关情况奏报清廷,并邀请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等当地官员来实验室查看分析结果,以引起他们对于疫情防控的特别重视。

在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七天时间里,他与助手林家瑞同当地的姚医师、孙医师走访了傅家甸一带,并和俄国医师哈夫金诊察了中东铁路院所收治的病患。中国地方当局对于疫情防控的松散麻痹与俄国医师未采取防护就直接面对病患的做法,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这样的现状,伍连德向清廷发出了一份电函,详细阐明了建立相关防疫组织与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九点建议。伍连德的九点建议成为了开展防疫工作的重要指针,而清政府也责成傅家甸当地官员逐步落实了有关场所的辟建工作,并通过与日俄两国的交涉取得了必要的支持与合作,为最终扑灭疫情创造了稍显有利的外部环境。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又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五日,以防鼠疫蔓延。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两枚,死鼠给铜圆一枚。

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

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岔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北京则“令各街巷棚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在征得朝廷及地方官绅同意后,伍连德率领防疫部门将辖区内数千具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以彻底杜绝鼠疫的传染,这在守旧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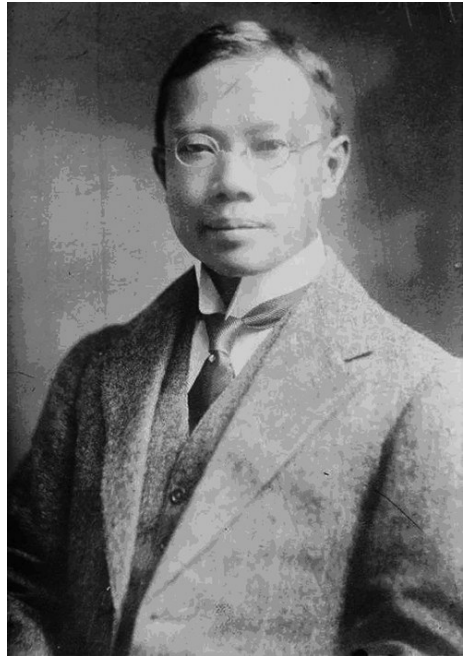
由于各种防疫措施处理得当,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指挥这次防疫的伍连德也因此名扬世界。

由于事起仓促,防疫人员来不及培训,加上当时鼠疫是不治之症,以及科学的局限和知识的普及程度等因素,防疫队伍殉职率极高,2名协和医学堂的医学生殉职,其中一名是学堂最聪慧的学生。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史料中无法查及两位殉职学生的姓名。协和医学堂获得中央政府的信赖和褒奖,协和师生抗击鼠疫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国。

为防止鼠疫再次暴发,伍连德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赞助下,于1912年建立东北防疫处,并先后是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及营口等处建了6所新式防疫医院。平日应诊,疫时防治,成为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中心,之后,伍连德驻守中国东北防疫、抗疫一线20余年。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伍连德更是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据统计,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间,大鼠疫造成死亡近6万人。在鼠疫传播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

这次鼠疫防治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最具科学性的卫生举措,初步确立了中国的防疫制度,防疫事业也逐步兴起,防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诞生,即宣统三年出台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所防疫医院——滨江医院,此时中国防疫水平已超过俄、日两国。 □额尔瑾



青年时期的伍连德